

崔融作品考辨

过 文 英

本文所要讨论的崔融是高宗、武后时期的著名文人^①,与杜审言、李峤、苏味道同为文章四友,世称“崔、李、苏、杜”(《新唐书·杜审言传》),崔融“为文华婉,当时未有辈者,朝廷大笔,多手敕委之”(《新唐书》本传),李峤称其“词丽扬班”(《授崔融著作郎制》),张说赞其文“如良金美玉,无施不可”(《旧唐书·杨炯传》引)。由此不难看出崔融在初唐文坛上的声誉和地位。崔融的诗也写得相当出色,傅璇琮先生认为崔融的《关山月》很能让人联想起李白诗来,但“现在一些文学史著作及唐诗选本对崔融诗却重视不够,甚至没有一字论及,因此这里特地提及,希望引起文学史家的注意。”^②

关于崔融作品,《旧唐书·经籍志》著录“崔融集四十卷”,而《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崔融集六十卷”,郑樵《通志》亦谓六十卷。崔融的作品大多散佚,流传下来的仅有诗一卷(《全唐诗》卷六八),文四卷(《全唐文》卷二一七一二二〇)^③。《全唐诗》、《全唐文》对于崔融作品的收录,既有重出互见,又有误收、漏收,试加以甄别、补充。

《塞垣行》

《全唐诗》卷六八收录此诗,题下小注云:一作崔湜诗。同书所收崔湜诗三十八首,其中也有《塞垣行》,题下则注:一作崔融诗。

①详考有关史籍,唐代名为崔融者,似乎有多位:一位生活于太宗时期,《文苑英华》于《为许智仁奏怀州黄河清表》、《贺秦州河清表》下署为太宗时崔融作。一位是本文所要讨论的高宗、武后时期的著名文人,是文章四友之一。一位出崔氏清河小房,官至右司郎中(《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李冲墓志铭》(《唐代墓志汇编》)云:“(李冲)夫人清河崔氏,右司郎中融之第三女”,所言当为同一人。崔氏卒于天宝五年(747),则此崔融也生活于唐初。另一位是晚唐崔融,《全唐诗》卷八八七收其诗《题惠聚寺》,称此崔融为“乾宁中(894-898)吴郡人”。

②《唐代诗人丛考·杜审言考》,中华书局,1980年。

③此外,王重民等《全唐诗外编·全唐诗补逸》收录崔融《太平兴龙寺》、《宝名》,《唐文拾遗》收《荷华贴》,《唐文续拾》收《赠兵部尚书房忠公神道碑》,周绍良、赵超《唐代墓志汇编续集》收录《薛元超墓志铭》,陈尚君《全唐文补编》收《加相王封制》。

据两唐书《崔仁师列传》所附《崔湜列传》，崔湜与崔融乃同时代人，主要生活于武后、中宗时期。“少以文词称”，先后依附武三思、上官昭容与安乐公主，在武后、中宗执政时期权倾一时，炙手可热。

《唐人选唐诗·搜玉小集》^①，崔湜名下即有《塞垣行》。《唐人选唐诗(十种)》，大多是代表唐诗发展中某一阶段或某一流派的选本，而佚名的《搜玉小集》选“四杰”至沈宋等诗作，主要体现“初唐体”的风貌，编者为唐代人，又熟悉初唐的诗歌创作，认为《塞垣行》乃崔湜所作，较为可信。又敦煌石函卷子本《珠英学士集》^②录崔湜诗九首，其中即有《塞垣行》，字句与《全唐诗》稍有差异，对照如下(括号内为写本《珠英学士集》)：

疾风卷(度)溟海，万里扬砂砾。仰望不见天，昏昏竟朝夕。

是时军两进，东拒复西敌。蔽山张旗鼓，间道潜锋镝。

精骑突晓围，奇兵袭暗壁。十月边塞寒(塞寒整)，四山沍(冱)阴积。

雨雪雁(应)南飞，风尘景西迫。昔我事讨论，未尝怠经籍。

一朝弃笔砚，十年操矛戟。岂要(客邀)黄河誓，须勒燕然石(山在)。

可嗟牧羊臣，海上久为客。

根据两唐书和《唐会要》记载，武则天在圣历二年(699)置控鹤府(后改为奉宸府)，令内宠张易之、张昌宗引文学之士于内殿修撰大型类书《三教珠英》，时称“珠英学士”，其中即有崔湜^③。在近三年的修书过程中，珠英学士们“日夕谈论，赋诗聚会”(《旧唐书·徐坚传》)，崔融则集其所赋诗为《珠英学士集》^④。《珠英学士集》为崔融所编撰，其言《塞垣行》一诗的作者是崔湜，则是诗非崔融之作无疑。

《吴中好风景》

洛渚问吴潮，吴门想洛桥。夕烟杨柳岸，春水木兰桡。城邑南楼近，星辰北斗遥。无因生羽翼，轻举托还飙。

此诗又见于《全唐诗》卷九二李义诗中，题作《次苏州》。详考史籍，从宋

①《唐人选唐诗(十种)》，中华书局，1958年。

②《英藏敦煌文献》第四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徐俊：《敦煌诗集残卷辑考》，中华书局，2000年。

③《唐会要》卷三六：“大足元年十一月十二日，麟台监张昌宗撰《三教珠英》一千三百卷成，上之。初，圣历中，以上《御览》及《文思博要》等书，聚事多未周备，遂令张昌宗召李峤、阎朝隐、徐彦伯、薛曜、员半千、魏知古、于季子、王无兢、沈佺期、王适、徐坚、尹元凯、张说、马吉甫、元希声、李处正、高备、刘知几、房元阳、宋之问、崔湜、常元旦、杨齐哲、富嘉謨、蒋凤等二十六人同撰。于旧书外，更加佛道二教，及亲属、姓名、方域等部。”

④《新唐书·艺文志》：“《珠英学士集》五卷，崔融集武后时修《三教珠英》学士李峤、张说等诗。”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二十载：“《珠英学士集》五卷。右唐武后朝诏武三思等修《三教珠英》一千三百卷，预修书者四十七人，崔融編集其所赋诗，各题爵里，以官班为次，融为之序。”

代开始,对于此诗的作者即有两种说法:一为“崔融作《吴中好风景》”说,一为“李义作《次苏州》”说。

就现存的文献而言,对“洛渚问吴潮”一诗最早持“崔融说”的是《吴郡志》^①和《吴都文粹》^②。《吴郡志》为南宋吴郡人范成大编撰,其书于卷四十九《纪咏》下列白居易两首《吴中好风景》,后为“崔融次韵”。稍后德祐间同是吴郡人的郑虎臣,在其编撰的《吴都文粹》中,于卷十《吴中纪咏》下也列白居易两首《吴中好风景》,第三首即为“崔融次韵”。两书的著录基本相同,字句稍有差异。范成大《吴郡志》收录白居易《吴中好风景》诗二首如下:

吴中好风景,八月如三月。水荇叶仍香,木莲花未歇。海天微雨散,江郭纤尘灭。暑退衣服干,潮生船舫活。两衙渐多暇,亭午初无热。骑吏语使君,正是游时节。

吴中好风景,风景无朝暮。晚色万家烟,秋声八月树。舟移弦管动,桥拥旌旗驻。改号齐云楼,重开武丘路。况当丰熟岁,好是欢游处。州民劝使君,且莫抛官去。

两书的编撰者均称“崔融次韵”,即认为“洛渚问吴潮”一诗乃是次白居易《吴中好风景》之韵而作,后人称此诗为《吴中好风景》大概由此而来。但崔融次韵说存在重大疑点:

其一,由此诗次白居易诗韵可推断,作者的生活年代必不早于白居易(772-846),或同时,或稍后。因而若此诗确为崔融所作,则绝非武后时期崔融所作,而有可能出自晚唐崔融之手。

其二,仔细对照白居易诗和崔融诗,“次韵说”并不成立。所谓“次韵”,在诗歌创作上有严格规定,须按原诗之韵及其用韵的先后次序写诗。崔融诗与现存白居易诗并不存在此种关系。

明代钱穀编撰的《吴都文粹续集》^③卷二也载录了这首诗:

洛渚问吴潮,吴门草色饶。晚烟杨柳岸,春水木兰桡。

城邑南溟近,星辰北斗遥。无因生羽翼,轻举托还飙。

对照《吴郡志》和《吴都文粹》,字句略有差异,但基本相同。值得注意的是《吴都文粹续集》并未沿袭前人次韵之说,而是冠以“吴门”之题,很有可能编撰者已对次韵说产生了疑问。

“李义作《次苏州》”说始见于宋代的诗文总集《文苑英华》卷二九〇,《文苑英华》于李义名下录此诗,题作《次苏州》。明代曹学佺所编《石仓历代诗选》也载录了这首诗。至清代,康熙四十五年徐倬所编《全唐诗录》卷九收录了李义这首《次苏州》。《佩文韵府》于卷三六“渚”字韵“韵藻·洛渚”下引

①(宋)范成大:《吴郡志》五十卷,四库全书·史部地理类。

②(宋)郑虎臣:《吴都文粹》九卷,四库全书·集部总集类。

③(明)钱穀:《吴都文粹续集》五十六卷补遗二卷,四库全书·集部总集类。

“洛渚问吴潮，吴门想洛桥”；《骈字类编》卷五一也于山水门“洛”之“洛渚”下引同诗，两书均署“李义《次苏州》”。

《文苑英华》所称李义，其生活年代稍后于崔融。两唐书《李义列传》称其“工属文”，与其兄尚一、尚贞以文章自名，弟兄同为一集，号《李氏花萼集》。李义少年时即得到中书令薛元超的赏识，永隆二年（681）进士及第，长安年间，擢监察御史，迁中书舍人，修文馆学士。睿宗时期，又任吏部侍郎，改黄门侍郎，中山郡公。开元初，转紫微侍郎，不久任刑部尚书。苏颋所作《李义神道碑》称李义“调补潞州壶关，婺州武义尉”，若《次苏州》确为初唐李义所作，则很可能作于其途经苏州之时。

根据史籍记载，中唐时期也有一李义，如元稹《元氏长庆集》卷五一《永福寺石壁法华经记》记载长庆四年杭州永福寺刻石法华经，捐钱者有当时的九位刺史，其中有杭州刺史白居易、越州刺史元稹及苏州刺史李义。明代卢熊所撰《苏州府志》卷十八“牧守题名”列“李义：长庆二年八月以御史丞为苏州刺史”。从两书记载来看，李义曾在长庆年间任苏州刺史，因而也有可能作《次苏州》诗。

就诗题意义而言，在古汉语中，“次”一般解释为短暂驻扎或停留，诗题“次苏州”或可解释为在苏州短暂停留，而根据《李义神道碑》的描述，初唐李义在上任途中有可能曾路经苏州，若此，诗作则很有可能出自其手。

从以上分析来看，“洛渚问吴潮”一诗的作者不可能是初唐崔融，而极有可能是初唐李义。

《游东林寺》

此诗《全唐诗》未见著录。赵明诚《金石录》卷九：“崔融题东林寺诗，正书，无姓名，元和十三年二月重刻。”陈思《宝刻丛编》卷十五引《复斋碑录》（五代时人作）：“唐崔融《游东林寺》诗，正书，无姓名，元和十三年二月二十九日曾孙江州刺史能重刻。”宋代陈舜俞《庐山记》^①卷四载录了题为崔融所作的《游东林寺》：

昨度匡山下，春莺晓弄稀。今来湓水曲，秋雁晚行飞。
国有文皇召，人惭谪传归。回行过梵塔，历览遍吴畿。
杏树栽时久，莲花刻处□。南溪雨飒飒，东岘日辉辉。
瀑溜天童捧，香炉法众围。烟云随道路，鸾鹤远骖騑。
远上灵仪肃，生玄谈柄挥。一兹观佛影，暂欲罢朝衣。

诗后注云：“元和十三年二月二十九日，曾孙朝散大夫使持节江州诸军事守江州刺史上柱国清河县开国男赐紫金鱼袋能再刊勒。”据《新唐书》本传及同书《宰相世系表》，崔融子崔翹的第三子为崔异，而崔异第四子即崔能。

^①罗振玉辑：《吉石庵丛书二集》影印日本内阁文库藏古钞宋刻五卷本。

此诗又见《永乐大典》^①卷六六九九《九江府十一·寺院》引《江州志》：“太平兴龙寺在虎溪，本晋东林寺。太元九年桓伊置。法师慧远道场也。……《元一统志》：‘东林禅寺，旧志载在州境。晋武帝太和十年建，唐号太平兴龙寺，最为庐山之古刹。寺有慧远袈裟。’……（寺）有刘孝绰、孟浩然、李白、崔融、钱起、裴休、皇甫冉、杜荀鹤及乐天之诗。”《大典》所引字句与《庐山记》略有不同，《大典》首句作“昨度斤山下”，庐山又名匡山，《大典》本作“斤”似错录宋本“匡”之讳字。第三句作“今来盆水曲”，按，“盆水”即“湓浦”，据《江州志》、《舆地纪胜》记载，庐山在德化县，县西一里有湓浦，晋志作“盆”，隋作“湓”。《太平御览》卷六五地部三〇“湓浦水”：“《郡国志》曰：湓浦水，有人此处洗铜盆，忽水暴涨，乃失盆，遂投水取之。即见一龙衔盆。遂奋而出，故曰盆水也。”“莲花”一句所缺字，《大典》作“微”。

《咏宝剑》

宝剑出昆吾，龟龙夹采珠。五精初献术，千户竞沦都。

匣气冲牛斗，山形转辘轳。欲知天下贵，持此问风胡。

此诗《全唐诗》卷六八收为崔融诗，而《太平御览》卷三四四作梁崔鸿诗。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北魏诗》据《太平御览》录于崔鸿名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一书考订精审，多有独到见解，逯氏未采《太平御览》“梁崔鸿”说而列崔鸿为北魏朝，这是对的。有关崔鸿的事迹详见于《魏书》卷六七、《北史》卷四四《崔光传》，均称其仕于魏朝，而崔鸿墓志的发掘也印证了这一点：《临淄北朝崔氏墓》^②题“魏故使持节镇东将军督青州诸军事度支尚书青州刺史崔（鸿）文贞侯墓志铭（孝昌二年九月十七日）”，可见《太平御览》“梁崔鸿”说有误。据史籍记载，崔鸿与崔融同属南祖崔氏房，“少好读书，博综经史”，曾撰《十六国春秋》^③，但在现有的文献中，未发现崔鸿的其他诗作。

《咏宝剑》一诗的作者究竟是谁？是否如《太平御览》所称为崔鸿所作？考察唐代之前所修类书《北堂书钞》，兵部宝剑类下并无“崔鸿《咏宝剑》诗”之语。在现存的史籍中，初唐时期徐坚所修的《初学记》最早著录了《咏宝剑》诗，《初学记》于卷二二剑第二下引《咏宝剑》诗全文，并题为“崔融”所作。徐坚与崔融乃同时代人，且两人共同参与了初唐时期的许多大型文学活动，如徐坚曾与崔融同撰《则天皇后实录》（《新唐书·艺文志》），又徐坚曾参与《三教珠英》的修撰（《旧唐书·徐坚列传》），崔融则编与修者诗为《珠英学士集》五卷。从两人的交往来看，徐坚所言当不致误。此诗后又为唐佚名所编《搜玉小集》收录。《搜玉小集》收崔融诗三首：《西征军行遇风》、《韦长史挽歌》及

①《永乐大典》，中华书局，1986年。

②《考古学报》1984年第2期。

③《唐代墓志汇编续集·唐故崔公（穆）墓志铭并序》：“祖鸿，宦至兰台，撰《十六国春秋》。”

《咏宝剑》，于《咏宝剑》诗题下注：“向误宋之问”，似乎在唐代，关于此诗的作者还曾有所争议，但并无崔鸿作的说法。唐代以后，此诗又不断被收录，如南宋计有功所撰《唐诗纪事》卷八《崔融》引《咏剑》诗，明代陆时雍《唐诗镜》卷二、清代类书《渊鉴类函》卷二二三“剑五”、《佩文韵府》卷七“胡”字韵“韵藻·风胡”条均引《咏宝剑》诗，署崔融。据此，大致可以推断《咏宝剑》一诗当为崔融所作。《太平御览》、《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言“崔鸿”有误。

需要补充的是，对于诗歌本身的考察，也有助于我们确定《咏宝剑》诗的大概写作年代。在此可以引用日本学者樋口泰裕的研究成果，在《北朝诗格律化趋势及其进程》^①一文中，樋口泰裕为探索北朝文人在诗歌创作上的声律意识，从生活年代上把北朝的诗歌创作分为四期，在列表分析第二期文人（生活在太和年间而东西晋分裂以前去世）所创作的诗歌时，他引用了《咏宝剑》一诗。通过分析认为：“北魏第二期的文人在他们的诗歌创作上，具有较强的声律意识。然而，或许由于意识不周、或许由于技术问题，还是没能避开鹤膝。”但《咏宝剑》诗则避开了鹤膝这一声病，作者所体现的声律意识与同时期的诗人相比，显得更为自觉、强烈。这一分析虽不能直接证明《咏宝剑》为崔融所作，但也可以视为佐证，因为众所周知，对于声律技巧的运用，初唐诗人远较北魏诗人娴熟，《咏宝剑》诗作者对于声律技巧的自觉运用，更似唐人。

《为许智仁奏怀州黄河清表》

《全唐文》卷二一八于崔融文中收录了此表，但《文苑英华》却于此表题下署名为太宗时崔融作。按《元和姓纂》卷六“安陆许氏”：“智仁，右屯田（卫）将军，怀州刺史，许（孝）昌公。”《唐会要》卷八十亦称“怀州刺史孝昌县男许智仁”，两唐书本传未及怀州刺史，唯称封孝昌县公。《旧唐书》谓许智仁“贞观中卒”。又表称“臣以去岁得河内县申云，自太平邨已下三十馀里，河水变清”，“凉山立石，式昭灵命”。按《新唐书·五行志》记载，怀州河清是在贞观十六年，凉山立石是在十七年，则此表应作于贞观十七年。生活于武后时期的崔融，断不可能作此表，疑为太宗时崔融所作。

《贺秦州河清表》

《全唐文》卷二一八于崔融文中收录了此表，而《文苑英华》于题下亦署名太宗时崔融作。关于秦州河清一事，《新唐书·五行志》记载：“贞观十四年二月，陕州、秦州河清。”此表或亦为太宗时崔融所作。

《为成魏州贺瑞雪庆云日抱戴表》

《全唐文》卷六二六于吕温文中收录此表，而《文苑英华》卷五六一收此文则不署名，《吕衡州文集》也未收此文。吕温乃中唐时人，与柳宗元、刘禹锡等人有交往，吕温死后，柳宗元曾作《唐故衡州刺史东平吕君诔》、《祭吕衡州文》。劳格《读全唐文札记》（《读书杂识》卷八）认为此表为《全唐文》卷六二

^①《社会科学战线》1996年第6期。

六误收,并非吕温所作,而疑为崔融文,但未及“成魏州”其人。详考有关史籍,中唐时代并无在魏州任职的成姓官员,而初唐则有魏州刺史成大辨。《杨炯集》卷七《唐赠荆州刺史成公神道碑》亦称:“我[大]周叙洪范,作武成……制赠荆州刺史。……长子司卫少卿兼检校魏州刺史大辨。”又崔融曾任魏州司功参军,有《为魏州成使君贺白狼表》。杨炯所言“魏州刺史(成)大辨”、崔融所言之“魏州成使君”以及表称“成魏州”或为同一人,则《为成魏州贺瑞雪庆云日抱戴表》很有可能出自武后崔融之手,而并非中唐吕温所作。

《唐朝新定诗体》

此书中国历代书目未见著录,惟《日本国见在书目》^①“小学家”类著录有“《唐朝新定诗体》一卷”,不题撰者。《文镜秘府论》东卷《二十九种对》提及“崔氏《新定诗格》”,又地卷《十体》引作“崔氏《新定诗体》”^②,可见《诗格》、《诗体》即为一书。今人推断所言“崔氏”即崔融,如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即持此说。而日人市河宽斋《半江暇笔》亦云:“我大同中,释空海游学于唐,获崔融《新唐诗格》……等书而归,后著作《文镜秘府论》六卷”。

《唐朝新定诗体》原书已佚,仅一小部分散见于《文镜秘府论》。在这一著作中,崔融总结前辈和时人的创作经验,对于诗歌的声律技巧,如声韵、对仗、声病等等进行了深入探讨,如在上官仪“六对”基础上提出“三对”:切侧对、双声侧对、迭韵侧对(《文镜秘府论·东卷》引),指出繁说、不调、丛木、形迹、翻语、相滥等声病,并以诗句为例具体说明(《文镜秘府论·西卷》引)。针对南朝诗歌声色大开而性情渐隐的状况,崔融还提出诗歌“十体”:“一形似体,二质气体,三情理体,四直置体,五雕藻体,六引带体,七飞动体,八婉转体,九清切体,十菁华体。”(《文镜秘府论·地卷》引)

综上,《塞垣行》、《吴中好风景》并非崔融所作,为《全唐诗》误收。《游东林寺》为《全唐诗》漏收。《咏宝剑》应为崔融所作,《太平御览》、《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误收。而《为许智仁奏怀州黄河清表》、《贺秦州河清表》二表,疑为太宗时崔融所作,而为《全唐文》误收。《全唐文》卷六二六收为吕温文的《为成魏州贺瑞雪庆云日抱戴表》,很可能出自崔融之手,而《全唐文》错收。此外,《唐朝新定诗体》也应为崔融所撰。

作者工作单位: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

①(日)滕原佐世撰,收于(清)黎庶昌所辑《古逸丛书》。

②(日)弘法大师原撰、王利器校注,《文镜秘府论校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